

艺苑纵横

寻找简牍影响书法史研究的证据

林秋秋



近期,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(湖南省文物保护利用中心)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、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,长沙市书法家协会执行的“简述湖湘——简牍书法研究展”在湖南美术馆展出。展览以三层结构展开:其一为简牍真迹的实物呈现,其二由40位专业学者对遴选出的《简牍书法经典四十品》进行题解与品评,其三则为当代书家基于简牍笔法体系所进行的创作实践。展览以出土简牍墨迹为根本取法对象,贯穿真迹、理论与创作三者,形成简牍书法研究中学术阐释与艺术实践的双向互动。

简牍如何影响书法史研究

简牍进入书法史的视野虽不过百余年,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书体演变的认知路径。20世纪之前,世人对汉隶的理解长期局限于碑刻的刀痕表现,往往将隶变简单归为秦篆的流变。而从战国秦简中捺势的初现,到西汉简牍中波磔的强化与草意的萌动,再到东汉简牍草化笔法的明确形成与情感表达,直至三国吴晋简中楷意的逐渐显现——这一完整历程清晰表明,驱动书体演变的本质,正是笔法自身的嬗变。

篆书圆转匀厚的笔意,在隶变中转化为搭接与波磔。隶书的方直搭接,在行草中演变为圆转与绞转。至楷书阶段,则形成了以顿挫分明、提按强化为核心的笔法体系,体现出理性与节制的新秩序。简牍墨迹作为研究书法史与书体演变的重要原始材料,其根本价值在于剥离了后世的刻拓与修饰,真实揭示出一条以笔法演进为核心、贯穿篆、隶、草、楷的书体变迁脉络。至今出土简牍已逾37万枚,这不仅根本改变了以往对书法史的固有理解——将隶书演变的发生时间从秦代小篆“书同文”之后,前溯至春秋战国时期,更具深意的是,简牍从笔法层面突破了传统基于碑刻的汉隶认知框架,通过墨迹本身清晰呈现出从春秋战国到两汉魏晋的笔法演进脉络,完整重构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帖学之前的笔法体系。这一认知转变,对书法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此次展览,展出了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至魏晋简牍珍品,包括《湘乡三眼楚简》《里耶秦简》《虎溪山汉简》《兔子山简牍》《渡头吴简》《郴州苏仙桥晋简》等珍稀原件。这些简牍墨迹作为未经刻工转译、直接保存书写原貌的“第一手墨迹”,真实承载了自战国至魏晋书体演变中笔锋使转、

节奏起伏与结构变化的全部细节。尤其湖南所出土的简牍,贯穿楚、秦、汉、吴、晋各代,构成一个连续而完整的地域书写序列,不仅勾勒出湖湘大地文字与书风变迁的清晰轨迹,也为探讨地域文化与书法演进之关系提供了实物脉络。

在浩繁墨迹中“披沙拣金”

中国文艺理论与书法批评领域,向来有深厚的品评传统。面对迄今已出土的逾37万枚简牍,如何从如此庞杂的实物中甄选出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典范性的作品,实现真正的“披沙拣金”,是一大挑战。这不仅考验研究者的文献考据能力,亦要求其具备对书法史脉络、书体演进逻辑与艺术风格体系的整体把握。

展览特邀40位学者,对精心遴选的《简牍书法经典四十品》进行题解与品评。在此过程中,学者不仅需细致对比各地域简牍的风格差异,更需敏锐捕捉隶变、草化及楷隶之变等关键阶段的笔法突破。以楚简为例,《曾侯乙·车马简》《信阳·隧二方娟简》《包山·东周简》《郭店·穷达以时简》等作品,结构虽已呈现由封闭向开放的过渡,然仍保留篆书结体,笔势自由跌宕,凸显楚简尚“奇”求新的审美取向,与秦简书风迥然有别。相较之下,秦简在结构与笔法上篆意更为浓厚,草化程度与笔势的奔放程度皆不及楚简,但其中已出现的“捺势”笔法,实可视为隶变进程中笔法演变的重要萌芽,如《青川·更修田律木牍》《云梦睡虎地·法律答问简》《岳麓书院藏·吏更治官及黔首简》《里耶·卅三年三月简》《周家台·胃斗简》等秦简,结体渐趋疏朗开阔,笔法虽不似楚简般飘逸洒落,却因承袭大篆笔意而形成浑穆敦厚的笔势,独具古端庄凝重之气。

在精选的汉简部分,可见仍延续秦简古隶风格的西汉简,如《银雀山·孙膑兵法简》《张家山·盖庐简》《印台·行凡简》《孔家坡·夏气简》《虎溪山·蒸稍简》。亦有同属古隶书体而笔意灵动飘逸者,如《马王堆·漆画简》《长沙走马楼·襄人敛賈简》《天回·治六十病简》。上述诸简在结构与用笔上仍保留篆书遗意。至汉武帝时期,隶书已趋于成熟,所选《悬泉置·奏书简》《额济纳·甲渠候官简》《定州八角廊·论语简》《武威·王莽礼仪简》《海昏侯·卜子简》《武威·特牲简》《居延·相利善剑简》《武威·王杖十简》《甘谷·元年十二月简》等,已以成熟隶书为主体,用笔波磔分明,点画由圆转方,标志着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过程。

基本完成。至于汉简草书的代表性作品,则包括《敦煌马圈湾·兵皇简》《肩水金关·褒致子元书简》《尹湾·神鸟傅简》《宋央宫·穗俱简》《居延·死驹劾状简》《居延·永元器物簿》等,从中可窥见后世大草与狂草绞转笔法的雏形。此外,《居延·寇恩简》《长沙东牌楼·督邮简》亦具有鲜明的草化特征。及至东汉晚期、三国以至晋代,《长沙走马楼·都市木牍》《郴州·田租赋税简》等作品,则已体现出楷书墨迹的特征形态,标志着楷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

古老笔法在当代的生长

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大量秦汉简牍的相继出土,为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墨迹材料与笔法参照。近20年来简牍书法的观念积淀与风格探索已趋于成熟,二者共同推动了当代简牍书写的取法与创作意识上的突破。

展览展出了42位当代书家的84件临摹与创作作品,正是基于简牍笔法体系的当代书法探索成果。要深入理解这类作品,观者需具备一定的传统书法修养,能从笔法源流、结构生成与笔墨节奏等层面,辨识书家对简牍精神的提取与转化。

这批作品并非对简牍真迹的简单摹写,而是体现出两个鲜明的共同取向:其一,注重对简牍渊源的梳理与提炼,笔意与结构上强调写意强烈、气象宏阔;其二,在融汇碑、帖传统的同时,尤为重视以篆隶笔意涵养简牍书写。不仅取简牍之率真鲜活,更融金文之浑厚朴茂、篆书之高古圆劲,使创作在气息与格调上超越形式拼合,形成笔法贯通、气质沉厚的整体风貌。

与历史文物中的简牍书法相比,今人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当代性:在章法上,突破了古代简牍因实用书写而形成的单行简幅布局,融入多样化的视觉构成与空间经营;在书写目的上,古人重在记录与沟通,笔触自然率真,而今人则转向自觉的艺术表达与风格建构,强调笔墨的审美表现力与文化诠释;在功能意义上,古代简牍承载文书传递之实,而今人作品则着眼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,在承接传统笔法的同时,融入当下的审美意识与个体精神。通过这些作品可见,当代书家已在笔法层面建立起贯穿篆、隶、草、楷的系统意识,使简牍不再仅是游离于主流笔法体系之外的“新体”,而成为衔接古典传统与当代书法创作的重要桥梁。



主旋律如何变身“流量密码”

覃杰

“歌人民”。“梦想有多长,希望在前方”——既呼应宏大主题,又道出百姓向往。2017年12月,歌词刊于《人民日报》副刊,即引广泛共鸣。作曲家孟文豪摒弃主旋律歌曲单一激昂模式,融雄浑与柔美,汇壮阔与温情,以中速抒情为基调,令旋律“携恢弘之气,叩柔软心扉”。央视春晚舞台上,廖昌永以醇厚之声、真挚之情,将精神内核转化为情感暖流。《信仰》获第十五届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国家级荣誉,入选多项重磅歌曲榜单。

“优秀作品是精神滋养,唯有兼具美学特质与时代价值,方能深入人心。”廖昌永此言,道出美育真谛。在创作《信仰》中,词作者杨文国精心打磨,数易其稿。后经词作者闻艺修润,视野更阔,意境更深,从“颂时代”迈向

全媒体传播矩阵。《信仰》在央视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、“学习强国”等重要平台亮相,实现了多场景、高频次、差异化的精准传播。同时,作品深度拥抱网络,强化互动共鸣。MV首月点击破5000万,转发超300万。“视觉赋能”与“多元演绎”更添感染力。MV融壮丽山河、奋斗身影于旋律;廖昌永经典版、平安流行版、金婷婷钟镇涛跨界版等,“一人一风格,一版一特色”。

“美育本质是以人为本,唯有扎根大众,方能实现心灵滋养。”廖昌永此论,在《信仰》中得到充分印证。《信仰》将个体奋斗融入国家征程,使得“人民富裕与安康”“祖国繁荣

与富强”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亿万奋斗者可感可及的目标与写照。凭借朗朗上口的旋律与激荡人心的歌词,《信仰》在湖南绥宁合唱比赛、浙江社区文化节、广东工厂文化活动中广泛传播,通过合唱、展演等形式转化为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;全国多地学校将《信仰》纳入教学,通过歌词解读、艺术分析,让青少年在审美体验中理解信仰内涵,实现美育与德育融合。

廖昌永在讲堂上展望艺术宏大愿景:“艺术润泽治理能力;以乐为桥,促进文明互鉴。”《信仰》的实践,将这一愿景具象化。它作为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特别节目的开篇之作响起;在强国兴军的征程上,它在国防军事频道的开播声中铿锵奏响;在多元舆论场中,它传递着坚定信仰、奋斗激情、家国情怀。在文明交流广袤舞台上,它扮演“文化信使”角色,通过海外华媒传播,触动海外游子心弦。

艺苑杂谈

刀郎的“可爱名场面”

徐亚平

舞台,21座城市的舞台,被刀郎当成了自家客厅。他往那儿一站,就等于宣告:今晚不搞包装,只唠真心。这份真心,有时是一件悄悄换上的白衬衫,有时是一句翻来覆去的“谢谢”,有时是爽快把C位让给别人,自己溜边儿唱歌。

他的打扮,简单得像出门散步——工装裤搭配T恤,灰扑扑的,像刚从菜市场溜达回来。武汉那场,唱到一半要换装,他转身走到台边,大大方方把外头长衫一脱,露出里头早穿好的短袖。没帘子遮,没灯光追,让观众都乐了:这哪是演唱会,明明是兄弟们在车库排练,热了随手一扒拉。

可一唱到《我的祖国》,他不知何时已换上笔挺的白衬衫,整个人庄重严肃。原来他早算好时间,趁徒弟徐子尧独唱《绣红旗》时,溜到后台火速变身。懂了,这是把仪式感,留给该敬畏的歌。

刀郎渴了,就从裤兜里摸出自带水瓶,仰头灌两口,又塞回去。唱累了,也不管地上干不干净,一屁股坐下。台下上万人齐喊“休息”,他喘口气站起来,迎面又是山呼海啸的“加油”。这哪儿还是演出,简直是双向奔赴的“江湖救急”。台上用命唱,台下用心疼,双方不是演员和观众,是歌者与知音。

话筒坏了?他低头拨弄两下,像在修家里接触不良的老台灯。这些“舞台事故”,在刀迷眼里全是限量版“彩蛋”。别人失误叫“翻车”,刀郎失误叫“可爱名场面”。

这哪里是疏忽,根本是他一贯的坚持:把舞台,还给音乐。

他就站在那儿,声音像条河,慢悠悠往心里淌。于是,舞台边界糊了、化了——台上是她,台下是万千跟着哼的你和我。荧光棒不是摇给明星的,是亮给自己心里那首歌的。

偌大场馆,忽然成了万人露天阳台,谁都能接一句,叹一声。

所以刀郎巡演到哪儿,哪儿就长出一片情感野草地。场内票早抢光,场外却自发聚起乌泱泱的人。

刀郎在济南唱《沂蒙山小调》,在南昌唱《映山红》。这些不是预设好的“安可”,而是到了你家乡,随手抓把土,放进旋律里还给你。音乐在这儿,不是商品,而是乡音、是清茶,是识途的老风。

刀郎的随性,是对舞台权威的“拆迁式改造”。在北京,当《我的祖国》前奏响起,他竟主动放下麦克风,退后一步,手臂一挥——把领唱权完全交给台下。甚至单膝跪地,用手势引导万人声浪的起伏,仿佛自己不是歌手,是这大合唱里一名兼职指挥。那一刻,舞台彻底消失。这不再只是演唱会,是一场与地方文化、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的仪式。

刀郎的感性,不打草稿。广州舞台上,唱到动情处,他忽然哽咽。徒弟徐子尧自然走上前,拍拍他的肩,接唱下去。没有尴尬,没有救场的慌张,整个画面暖得像家人间的换班。在这里,音乐是可倚靠的肩膀,也是彼此都懂的语言。

若说刀郎只是随性,那可能小看了他的通透。那些被镜头偶然捉住的“肚皮微露”“蹲地开唱”,不是失误,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舞台哲学——他早就亲手拆了那堵无形的墙。褪去商业修饰,他以本真的样子和深情的演唱,与观众建立了基于音乐与信任的连接。

是的,刀郎在演出中有太多“不按常理出牌”的随性瞬间,可正是这些不修边幅的细节,拼成了他独特的舞台魅力。这份“不表演”的真诚,让观众觉得面对的是一位热爱音乐、值得交心的歌者,而不是精心包装的偶像。

刀郎的可贵,或许就在于他从不刻意追求“隆重”,却偏偏赢走了观众的共鸣。

艺术论坛

公共艺术要与公众对话

关东客

近日,甘肃省瓜州县戈壁国际雕塑艺术长廊内的雕像作品《汉武雄风》,因其表现手法独特,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。

近年来,一些曾被冠以“先锋”“抽象”之名的公共雕塑,正面临越来越强烈的公众审视。这并非公众变得挑剔,而是随着社会进步与知识普及,人们的审美意识不断提升。人们对艺术创作,不再仅仅满足于外在形式,或盲目推崇某些概念,而是更加注重作品是否与自身的文化情感产生共鸣。

从艺术创作角度看,《汉武雄风》确有其创新意图。作者以“大地为身躯”的意象,试图将汉武帝与河西走廊的历史时空相联结,属于当代大地艺术的一种探索。

然而,公共艺术的特殊性在于,它必须面对超越艺术圈层的广大公众。当艺术语言与大众基于长期文化经验所形成的“期待视野”产生落差时,理解的鸿沟便会迅速浮现。

汉武帝在华夏儿女的集体记忆中是开拓疆域、彰显国威的雄主。因此,人们对“汉武雄风”的视觉表达,自然怀有威严、昂扬的期待。而雕塑所呈现的凝重感,与这一普遍认知之间产生了割裂。尽管创作者可能意在传递更复杂的沉思,但直观的视觉冲击往往先于深意被感知。

公共艺术一旦置于开放空间,便成为公共文化产品,必须接受公众评议。成熟的公共艺术项目,往往伴随着持续的公众对话,一项投入不菲、体量庞大的公共艺术品,从策划、立项到落成,理应具备更完善的公众参与与意见征询机制。

这场争议也带出一个深刻命题: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,公共艺术如何既保持创新锐度,又尊重公众的历史情感?我们需要那些打破常规、激发思考的作品。同时,涉及民族历史与集体记忆的题材,需要更多的文化敏感与沟通意识。这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更具对话精神的创作姿态,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同时,亦能理解并回应公众的情感诉求。

当一尊雕塑激起如此广泛的社会讨论时,或许正是我们重新思考公共艺术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契机。

音乐咖啡

主旋律如何变身“流量密码”

覃杰

岳麓山下,音符跃动,思想碰撞,在近期举行的“湘江大讲堂”上,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以“以乐为桥”为题,阐释艺术的社会价值与美育功能。他认为,艺术绝非阳春白雪的闲情逸致,而是涵养心性、润泽治理的精神资源。这一理念,与他2019年在央视春晚演唱的歌曲《信仰》形成呼应,绘就以美育人、以文化人的画卷。

“优秀作品是精神滋养,唯有兼具美学特质与时代价值,方能深入人心。”廖昌永此言,道出美育真谛。在创作《信仰》中,词作者杨文国精心打磨,数易其稿。后经词作者闻艺修润,视野更阔,意境更深,从“颂时代”迈向